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 「鬥鬼」風潮（上）

• 樊建政、董國強

摘要：在文化大革命最初兩個月裏（1966年6至8月），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始終是運動的主線。與流行甚廣的宏大敘述和「預謀論」不同，本文聚焦於復旦大學個案，以詳盡的史料，試圖洞悉文革初期復旦「鬥鬼」風潮的細微演變。本文研究發現，復旦以「鬥鬼」為運動主線，並非校內黨委陽奉陰違、以圖自保，而是他們一向緊跟毛澤東路線、自命政治正確，以為文革的打擊對象僅限於「反動學術權威」。復旦校內黨群分歧的根源在於，高層政治在極力動員群眾鳴放的同時，不斷指責基層黨組織「壓制群眾」；所謂「預謀論」的歷史錯覺之所以盛行於世，其主因在於過去論者忽略了「一元化領導」在文革爆發之時愈益走向極端化，「最高指示」往往成為政治運動中的唯一評判標準，基層黨組織無從置喙。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 復旦大學 「鬥鬼」風潮 一元化領導 走資派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三節。

一 前言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於1966年春夏親自發動的一場持續三年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其首要鬥爭對象是所謂「黨內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期間各級黨政幹部遭到批鬥、罷官，繼之以群眾組

* 拙文撰稿及修改過程中，金光耀教授惠賜了未刊稿〈文革爆發之初的基層黨委：以復旦大學為例〉，姜義華教授、桑玉成教授、王海光教授、韓鋼教授、沈志華教授、吳啟訥教授、曹樹基教授、黃道炫教授、葉維麗教授，兩位匿名評審專家及《二十一世紀》編輯部同仁，賜予了不可多得的指導意見，筆者特此鳴謝！

織之間的派性武鬥，使「文化大革命」演變成「武化大革命」^①。然而追根溯源，這場持續多年的動亂與浩劫，確實和此前一場所謂「文化革命」有關。那次「文化革命」是1963年興起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試圖通過大力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各種「反動言論」，強化黨的意識形態管控，重塑因大躍進失敗而受損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和毛澤東的英明形象（此即「小文革」）。後因在批判吳晗的問題上黨內出現意見分歧，「文化革命」隨即轉化為「政治清洗」。復因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未能滿足毛澤東的願望，促使他轉而發動紅衛兵運動以克服黨內紛爭^②。

儘管從中共高層政治發展看，1966年前八個月經歷了從「文化革命」到「政治清洗」，從「黨內鬥爭」到「群眾運動」的重大轉向，但對基層單位幹部群眾和中小學教師學生而言，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揭幕的文革乃是前述「小文革」的繼續，是一場在思想、文化、藝術、教育等領域開展的意識形態大革命，是一場新形勢下的「反右運動」。因而從6月初開始，全國各地均有無數大中小學領導和普通教師、科研機構專家學者、宣傳文教口領導幹部、知名作家和藝術家等被視為「牛鬼蛇神」^③遭到口誅筆伐，形成「鬥鬼」風潮；進入8月後，這場意識形態鬥爭甚至升級為大規模暴力摧殘，乃至有人被迫害致死^④。

「鬥鬼」風潮的最高潮當屬1966年8月初風行上海高等院校的「鬥鬼風」，與此前相比，其顯著之處為暴力事件的波及範圍和暴戾程度。這場「鬥鬼風」始於華東師範大學，其羞辱、折磨批鬥對象的方式包括站「鬥鬼台」、掛「牛鬼蛇神」牌、戴高帽、罰跪、潑墨、塗黑臉、剃「陰陽頭」、拳打腳踢、遊街，等等。8月4日，華東師大共有194人被揪鬥，佔教職員總數9.8%，其中3人自殺、2人自殺未遂^⑤。5日晚至7日，復旦大學有近50名專家和黨員幹部被揪鬥^⑥。8日上午，上海財經學院95人被戴高帽，佔全院教職工總數19%。9至11日，同濟大學15人被揪鬥（包括一名副校長）。10日，上海交通大學15人被揪鬥，其中13人被戴高帽。11日晚，上海體育學院24人被揪鬥，其中正副教授10人（佔全院教授總數60%），講師2人，教輔人員10人，職工2人；同日上海外語學院80人被揪鬥。12至13日，上海第一醫學院123人被揪鬥、97人被抄家。15日，上海科技大學26人被揪鬥，部分人被關「牛棚」。25日上午，上海鐵道學院12名學校幹部被強迫站桌椅、遭煙熏火烤^⑦。

迄今為止，涉及文革初期暴力事件的研究更多聚焦於中學，如葉維麗對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卞仲耘案的研究等^⑧。至於高校「鬥鬼」風潮的情況，往往僅作為宏觀文革敘述之必要組成被簡要籠統地提及，如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王紹光的《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等著^⑨，細緻入微的個案實證研究暫付闕如。在解釋此類暴力事件的成因時，葉著將卞仲耘案置於「文革再發動」的分析框架下，認為首要原因在於撤銷工作組導致基層權力真空、組織癱瘓，其次是中學青年要「表演革命」；一言蔽之，「學生打老師」源自「文革再發動」所導致的失序，進而導致暴力失控^⑩。《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則指出，高校之所以會颶起主要針對著名專家學者

的「鬥鬼」風潮，其因由在於「毛說的文革的重點『在內、在上』的完整內涵還未能被人們所理解」^⑩。上述洞見極富啟發性，但存在進一步討論空間。葉維麗的分析框架，將暴力動因置於高層、中層及基層之間的政治互動中展開分析，但沒有將「文革再發動」與「初發動」聯繫起來，以解釋為何受害人始終以專家學者居多？馬若德和沈邁克突出強調了〈五一六通知〉的文本解讀問題，但其論點不免有「預謀論」之嫌，所提供之論據即便可以採信，也存在寓意寬泛、含糊，甚或自相矛盾之處^⑪。

本文重點探討復旦1966年6至8月文革運動發展情況，特別是從批判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周谷城、周予同（以下簡稱「二周」）等人，批判已調離復旦的前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陳傳綱，到揭批復旦黨委宣傳部部長徐震，再到「鬥鬼風」颳起，復旦文革運動在最初兩個月中經歷的階段性變化，揭示該校師生員工最初如何理解和應對中央發出的文革號召？校黨委和少數師生為何漸行漸遠乃至形成對峙？沒有派駐工作組的復旦為何在毛澤東批評工作組後同樣出現「權力真空、組織癱瘓」現象？為何該校被鬥、被打的對象始終以專家學者為主體？本文立論主要依據如下史料：（1）群眾組織編印的上海文革大事記；（2）時任上海市委主要領導言論集；（3）復旦黨委會議記錄；（4）某些黨政幹部的工作筆記、交代材料；（5）復旦各派群眾組織編撰的大事記、大字報選、報刊；（6）復旦文革親歷者日記；（7）1980年代復旦黨委有關文革期間重大事件的複查處理結論；（8）眾多親歷者的口述歷史資料等。

二 華東局、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對〈五一六通知〉的反應

〈五一六通知〉是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反映他發動文革的動機和預期。該通知首先於1966年5月16日以內部文件形式下達至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翌年5月17日才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它宣稱文革運動的鬥爭對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和「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號召全黨「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清洗「資產階級代表人物」^⑫。

5月21日，〈五一六通知〉正式文本下達上海，市委立即召開書記處會議和常委會議學習、討論。22日起，市委向下屬各級組織下達〈關於認真學習討論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並全文轉發〈五一六通知〉及附件。27至30日，市委召集全體委員（擴大）會議，討論如何開展文革。這次會議分析了上海文教單位和黨校、社會科學院、各種文藝家協會，以及各種哲學、社會科學等思想文化領域的現狀，確定上海文革運動重點放在文教部門。6月2日，上海市委決定成立市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與此同時，各部、委、辦、局、區、縣、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相繼成立文革領導小組^⑬。3至17日，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分管宣傳文教工作的楊西光五次召開上海市各高校黨委書記會

議，指示他們「要趕快把運動引向深入，要批判學校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具體措施包括：「一、學生用大字報揭發問題，他們願批評誰都可以，不加阻止。二、重點形成：（一）靠學生揭發出來的材料；（二）領導調查研究；兩者結合。三、這次是揭批披着紅旗反馬列主義的，是『反修挖根』。四、對重點對象一定要徹底打倒，第一步把黨內外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打倒。」他還說，「這次鬥爭的對象就是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和黨外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其他市委領導也多次向各高校黨委書記強調，「要把批判重點搞清楚」^⑮。

華東局也在6月3至6日召集書記處會議，傳達、討論〈五一六通知〉。21日，華東局專門就如何開展文革運動的政策和部署等問題向中共中央提交報告，主要內容包括：（1）大膽、放手發動群眾。（2）堅定地依靠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和打擊右派；要注意把資產階級「學閥」、「權威」，同有一般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對於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單位、要害的人物，特別是要首先抓黨內走資派。（3）重新組織革命的文化隊伍。（4）四清運動要以文革為中心。（5）加強黨對文革的領導。毛澤東對華東局的報告十分重視，隨即函告劉少奇和鄧小平，「華東局二十一日給中央報告華東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參考」^⑯。

以上一系列動作表明，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對中央發出的文革號召是高度重視、積極響應的。其最初的運動部署，包括認定「資產階級學閥」和「黨內走資派」為鬥爭對象，都得到毛澤東的肯定。不過，在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人看來，自己與「黨內走資派」概念扯不上任何關係。主持工作的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長曹荻秋，在6月的某次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為領導幹部定調說：「我們在座的都是一、二類幹部」，言下之意，只有在基層單位才能找到一些「三、四類幹部，把矛頭指向下面」；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他還多次對幹部講：「中央對上海市委是了解的」，「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義的怕炮轟，大炮也轟不垮」^⑰。時為上海文革小組組員，曾參與市委書記常委會議、並執筆起草重要社論與講話稿的中層幹部馬達自述，當時市委領導人根本未想到自己會是文革的鬥爭對象，更不曾想到會引火燒身，他們認為文革就是要批判一些文化界名人，即使他們在以往工作中存在一些缺點錯誤，也應該在黨內會議上解決^⑱。

另一位後來成為市級機關造反派頭頭的青年幹部徐景賢在運動初期亦認為^⑲：

上海市委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過程中，包括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中，整體是站在革命方面的。……市委主要領導從柯慶施到後來的陳丕顯，作為第一書記都積極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路線，陳丕顯還參與領導了對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討論。這是我親眼所見。而且，周總理也說過「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對這樣的市委如果要造反，我覺得理由不夠充分。

這些看法絕非空穴來風。長期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的柯慶施，以一貫積極緊跟毛澤東的路線著稱，深得毛澤東青睞，是「毛主席的好學生」^⑳。1965年柯慶施去世後，接替其領導職務的魏文伯同樣深得毛信賴；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其他領導人也是毛的積極追隨者。名噪一時的大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從1965年2月起草到11月公開發表，自始至終得到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人的精心指導和大力支持，並非張春橋、姚文元的個人行為^㉑。1966年4月16日，〈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在上海錦江飯店成立，上海市委更是全力配合^㉒。在5月11日上海市委常委會上，曹荻秋說「姚文元同志的〈評「三家村」〉的文章，市委改了四稿」^㉓。21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次上海市在文革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學上海」^㉔。27至30日上海市委三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上，曹荻秋說：「這次文化革命是在上海發動的，是我們執行了主席的指示，上海這次是冒尖的。」^㉕7月21日，毛澤東審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草稿時，特別批示政治局，召開定稿會議時要有上海市負責同志參加^㉖。另據上海市委機關造反派揭發，文革最初幾個月裏，曹荻秋到處「嚇唬革命小將、廣大群眾和革命幹部」，宣稱「我們一直在柯老領導下工作的，幾年來上海各個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上海市委是正確的，革命的」^㉗。陳雲後來也說過，「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㉘。由此可見，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重要依託，也是當時積極緊跟毛澤東路線的典範。

復旦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尤其在長三角地區和上海市，享有獨特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影響力。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後，復旦共有教師311人，其中教授116人、副教授34人。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夕，復旦全校教師總數增至1,269人，其中教授75人、副教授42人、講師257人、助教895人^㉙。他們當中有全國政協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省市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還有不少著名專家學者曾任大專院校校長、獨立學院院長或系主任等職。這些人在國內外都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可謂大師雲集、群星璀璨。單就歷史系而言，師資陣容就十分強盛，如論者提到：「中國史有譚其驤、胡厚宣、陳守實；世界史有周谷城、潘洛基、耿淡如、王造時、陳仁炳、靳文翰、毛起、朱敖等；教地理的有葉粟如老師；教民族史的有馬長壽老師。」^㉚不過，在長期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氛圍中，復旦並非化外之地。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該校都有一些專家學者受到點名批判和嚴厲處分。與此同時，也不斷湧現出一些符合執政黨預期、「又紅又專」的中青年學術骨幹。因而，復旦也一直被視為「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先進典型^㉛。

復旦黨委對中央高層政治風向變化向來積極緊跟，四清運動期間和文革初期也不例外。1964年下半年，復旦就成立了「文科學術鬥爭領導小組」，在文科各系開展意識形態大批判活動。1965年上半年姚文元草擬〈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時，借調到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復旦歷史系中青年教師朱永嘉等人專門分工協作，為其搜集、整理各種相關資料。如果沒有他們的積極參

與，姚文元絕無可能寫出那篇文章³²。該文公開發表後，復旦黨委隨即組織全校師生認真學習，並開展了持續數月的討論，其規模之大、涉及問題之廣、政治站位之高，前所未有。在此期間，全校文科各系共成立幾十個寫作小組（其中校級的九個），公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十七篇。歷史系先後成立學生戰鬥小組三個、教師戰鬥小組兩個，共撰寫文章二百多篇；各系還爭相開設大批牆報³³。與此同時，華東局和上海市對復旦文革運動高度重視。運動之初，華東局負責人魏文伯曾親赴復旦看大字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部長常溪萍曾兩次在復旦召集座談會。曾任復旦黨委書記的上海市文革小組副組長楊西光親自掛帥，直接領導該校文革運動³⁴。上海市委還將復旦樹為運動樣板，指定該校黨委代理書記王零在上海各高校黨委書記會議上介紹先進經驗³⁵。

從上述情況可見，復旦一眾黨委在文革初期的想法，與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人一脈相承。1966年6月初，王零在校內各種會議上多次強調，「這次運動是搞老頭子的」，「〔復旦〕黨委是正確的，我王零也沒有甚麼大問題」，「不要以為上海的復旦就是北京的北大，不要以為北大有個陸平〔北大校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復旦就有一個王平」，「我王零如果是黑幫，你一張大字報也跑不了，如果不是黑幫，你貼一萬張大字報也不是黑幫」³⁶。復旦黨委亦「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要向資產階級『權威』、『專家』、『教授』、『祖師爺』開火，打倒『閻羅王』」，而自己卻是「絕對正確的」³⁷。一些校內中層幹部也認為，文革的鬥爭重點是「反動學術權威」，「黨委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因為「市委是緊跟中央的，黨委是緊跟市委的」³⁸。

三 復旦批判「反動學術權威」

如前所述，復旦早在文革爆發之前就捲入了一系列重要事件，這些重要事件也不同程度的波及到復旦校內。以二周為代表的十幾位「反動學術權威」首當其衝，遭到批判。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陽人，毛澤東的故舊，社會活動家，歷史學家，著名「紅色教授」，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大教聯）發起人之一。1949年後任復旦第一任教務長兼歷史系教授，1950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1954年起任全國人大代表，1958年起任農工黨中央副主席。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著名經史學家，五四時期進步學生領袖，後來一直是愛國民主運動鬥士，也是上海大教聯發起人之一。1949年後任復旦歷史系教授，還曾兼任副教務長、歷史系主任，以及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上海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等職。1964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事實上，作為長期親共的左翼知識份子代表人物，二周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一直作為高層統戰對象受到當局保護，他們後來被扣上所謂「反共老手」

的帽子似乎是難以想像的。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期間，他們均因一些「不當」言論而遭到程度不同的敲打，但整體影響不大。

例如，在反右運動中，復旦歷史系師生揭發周谷城「右派」言論多達十條，要定他為「右派」，後因上海市委干預才躲過一劫。1962年，周谷城在學術爭鳴中提出「無差別境界」論和「時代精神匯合」論³⁹，再次遭到本系師生批判。有人指責他：(1)以「無差別境界」否認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2)用「合二而一」對抗「一分為二」的革命辯證法；(3)販賣庸俗進化論，否認事物由舊質向新質的轉化；(4)鼓吹階級合作，否認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5)販賣社會達爾文主義，抵制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6)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吹鼓手、殖民主義的辯護士⁴⁰。

文革前對周予同的批判，也主要涉及其學術觀點。1962年，周予同發表〈有關討論孔子的幾點意見〉一文，批評「以論代史」、「唯成份論」、「否定一切」的傾向與做法，主張「首先要注意史料」，「不要先存對孔子肯定或否定或半肯定半否定的主觀」⁴¹。1963年，周予同發表〈博士制度和秦漢政治〉、〈從顧炎武到章炳麟〉等文章，反對「曲學阿世」，讚揚針砭時弊「能披統治階級的『逆鱗』」⁴²。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氛圍下，這些學術觀點被認為嚴重背離毛澤東倡導的「政治掛帥」原則和「階級鬥爭」學說⁴³。

由於二周等人時不時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唱反調，在1963年四清運動興起後，特別是在10月中央宣傳部負責人周揚提出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後，復旦黨委就布置各系對教授摸底排隊。歷史系黨總支隨即確定二周為重點對象，並着手整理他們的材料，為批判做準備。不過對如何掌握批判的火候，校系兩級領導一直非常謹慎，所以二周當時並未遭受太大衝擊。時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余子道回憶說⁴⁴：

〈五一六通知〉前，我們儘管認為他們〔二周等人〕這樣的言論、思想很嚴重了，要進行批判，但仍然視其為統戰內部的問題，總調子是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能搞成敵我矛盾。至於給他們戴甚麼帽子，我們一直也沒有正式決定。毛曾親自講過「我有右派朋友」，毛的意思是說這些朋友是統一戰線內部的右翼。

不料〈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後，二周和其他幾位上海學術界、文化界、藝術界名流在《文匯報》召集的座談會上發言，指責該文「亂箭射人」、「亂打一通」、「陷罪於人」，對遭到批判的吳晗深表同情，這使他們的「反動罪行」舊賬未了，又添新賬⁴⁵。因而到〈五一六通知〉發布前後，復旦黨委在公開批判二周等人的問題上不再遲疑。

1966年4月下旬，上海市委指示所屬高校，要以學術批判為中心組織教學工作，並要求各校確定本校學術批判對象——規模小的高校定二三名，規模大的高校定三四名。根據這個指示，復旦黨委最初確定三人作為本校重點批判對象——即歷史系教授周予同、周谷城，以及中文系教授蔣孔陽，後來又加上了中文系教授劉大杰。5月4日，校黨委又決定將重點批判對象增至五名

(新增的是哲學系教授嚴北溟)^④，並具體討論了五名批判對象的材料，明確了批判的先後次序及各人的批判重點。周予同被列為近期主要目標，重點批判他讚賞古代諍臣「披逆鱗」的勇氣，「夥同吳晗向黨進攻」；對周谷城，重點批判他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對劉大杰，則重點批判他的「安社稷」主張^④。被確定為全校重點的歷史系，於4月下旬在教師中組織戰鬥小組，專門撰寫批判文章。各戰鬥小組隨即開始對周予同所謂「黑文」進行整理評註，至5月中旬已寫出兩篇文章的初稿報校黨委審查^④。復旦黨委還要求其他各系排查情況，各自確定十個批判對象，發動學生準備他們的材料。校黨委還提示，如果有的教師沒有文章，可以組織學生查他講課的課堂筆記。不過在布置這些任務時，校黨委反覆強調要注意保密，整個學校的部署由校黨委掌握，不能對外告訴任何人，各系的部署也不能外傳。此外，還明確要求整個批判鬥爭要服從組織指揮，寫好的文章要交校黨委審查^④。

復旦在6月上中旬大張旗鼓地批判二周等人，與6月前後《人民日報》刊登〈把資產階級「權威」統統打倒，把毛澤東思想世代傳下去〉、〈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歡呼一張革命的大字報〉、〈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明顯有關^④。不過聯繫前文，不難看出這批專家學者其實早已在劫難逃。6月2日，復旦黨委接連召開了四次總支書記會議，布置發動群眾，逐個聽取各系匯報動態，並布置歷史系抓緊寫批判周予同的大字報^④。3日深夜，校黨委召開全校指導員緊急會議，宣布次日一早全校批判周予同。他們安排歷史系打頭陣，其他系隨後跟進，並就大字報如何寫、如何貼做出具體的部署。會後歷史系黨總支馬上叫醒學生幹部開會，布置抄寫及張貼大字報^④。校黨委還連夜派工人在校內主幹道兩旁拉起幾百米長的大字報欄，供師生張貼大字報。4日，復旦全校掀起批判周予同的熱潮。此後一周，全校共貼出批判周予同的大字報8,000多張。10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廣場召開文革動員會，曹荻秋主持並講話，周谷城遭到點名批判，由此二周問題被公開定性為敵我矛盾。11日，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揭露、徹底批判、徹底打倒〉，指控「周谷城拋出了『時代精神匯合論』」，「周予同發出了『披逆鱗』的極端反動的言論」^④。12至14日，復旦黨委多次召集全校黨團員和學生積極份子開會，要求他們認真學習曹荻秋6月10日講話。16日，校黨委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全面公布周谷城的「罪證」材料，讓全校師生批判。次日，全校開始停課批判周谷城^④。

隨着大批判運動不斷蔓延升級，至6月19日，復旦全校共揪出「牛鬼蛇神」十多人，朱東潤、戚叔含、蘇步青、談家楨等不同學系的知名專家學者均列其中(表1)。

復旦二周等人遭到公開批判，與北京大學聶元梓大字報事件的矛頭指向截然不同：北大大字報事件的攻擊對象是北大黨委幾位主要領導(「走資派」)^④；而復旦大批判運動的攻擊對象則是校內一批知名專家學者(「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種差異格局的形成，顯然與華東局、上海市委、復旦黨委對文革運動性質和目的的最初理解有關。儘管〈五一六通知〉明確提出了兩類鬥爭對象，但華東局、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自認為是毛澤東革命路線的積極追隨者，而非「走資派」，所以復旦等高校的「反動學術權威」便成為文革

表1 復旦批判「反動學術權威」一覽表(1966年6月2至19日)

姓名	所在院系及職務	研究專長	職稱	政治面貌
周予同	歷史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經學史、教育學、歷史學	教授	民盟
周谷城	歷史系、農工黨中央副主席	歷史學、哲學、美學	教授	農工黨
朱東潤	中文系主任	中國古典文學、傳論文學	教授	民盟
戚叔含	外文系	西洋文學、文藝理論	教授	農工黨
蘇步青	數學系、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數學、微積分幾何學	教授	中共黨員
嚴志弦	化學系、教務部副主任	絡合物化學	教授	中共黨員
談家楨	生物系主任	遺傳學	教授	民盟
焦啟源	生物系	植物生理學	教授	不詳
盧鶴紱	物理二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	核子物理學	教授	九三學社
劉振豐	復旦黨委委員、教務部副主任、中共哲學系總支書記	不詳	不詳	中共黨員
嚴北溟	哲學系	中國哲學史	教授	民主黨派
殷鵬程	物理系	不詳	講師	不詳
吳斐丹	政治經濟系	經濟學、人口理論家	教授	九三學社
錢行素	體育教研組	不詳	講師	不詳

資料來源：「過河卒」戰鬥小組編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打字油印件（1966年9月8日），頁17；「心向黨」戰鬥小組編，生物系「赤衛隊」翻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手刻翻印油印件（1966年11月14日）；《復旦大學百年志》編纂委員會編：《復旦大學百年志（1905-200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吳中杰：《復旦往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的主要鬥爭對象。與其他一些同類研究相比，復旦個案的特殊性在於，復旦黨委及其上級黨委的自我定位，最初得到校內廣大師生員工的普遍認同。換言之，華東局、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一貫正確」的形象根深蒂固，以致他們認為無需在北大大字報事件爆發後，費心操控群眾運動以自保。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初期復旦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其主觀動機是要緊跟毛澤東的最新戰略部署，但其實質內容卻是四清運動期間「文化革命」的持續與深化。對絕大多數校內幹部和「革命師生」而言，積極投身於批判二周等人的運動，是在新的形勢下積極緊跟毛主席路線的一個重要表徵。（未完待續）

註釋

- ① 〈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1968年10月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202。李鴻永指出，文革的特點就是「任意的暴力」。參見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8。
- ②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鄧杰整理：《巴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香港：大風出版社，2014)，頁1-42。
- ③ 「牛鬼蛇神」一語，源自佛教，1950年代開始進入毛澤東的詞彙之中，隨着《人民日報》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成為經典，文革期間特別指涉知識份子。詳見彭麗君：〈文革中的幽靈：作為牛鬼蛇神的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6年10月號，頁106。
- ④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97-102、130-40。
- ⑤ 毛主席警衛大隊：《今日長纓在手，何日縛住蒼龍？——華東師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介(1966年6月1日至11月7日)》，油印件(1966年11月13日)；華東師範大學校史黨史編委會：《華東師範大學大事記(討論稿)(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未刊稿(1990)，頁6。
- ⑥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63。
- ⑦ 據《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上海的這股「鬥鬼風」還蔓延至中小學、科研院所、電影、工業、交通、基建等單位。1966年8月7日下午，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能研究所7名副工程師遭遇站「鬥鬼台」、挨揍、遊鬥。13日，虹口區四平中學的校長和教師共23人被強迫在操場上爬行，其中17人被剃「陰陽頭」；同日上午，天馬電影製片廠37人被罰跪、戴高帽；當晚，普陀區安達中學300多名師生開會，11名教師被鬥；上海師範學院附屬中學9名所謂「重點對象」被勒令每天掛「牛鬼蛇神」牌、罰站、爬行。僅13至15日三天，就有30多所中學發生「鬥鬼」事件，共114名老師被打或戴高帽。24日一天，僅造船、冶金、電業三個系統的基層單位，就有417人被戴高帽遊街，其中中華造船廠被戴高帽遊街者近200人；同日，上海市公安局40多人被掛「牛鬼蛇神」牌、戴紙帽(或畚箕、痰盂)、罰跪。參見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纂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1992)，頁50-57。
- ⑧ 參見阿妮達·陳(Anita Chan〔陳佩華〕)著，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頁160-76；葉維麗：〈卞仲耘之死〉(未刊中譯修改稿)，葉維麗提供，英文稿參見Weili Ye, "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3, no. 2 (2006): 203-40；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打老師和打學生之間〉，載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17-48；《記憶》，總第80期(2012年1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三)」、總第106期(2014年增刊一，2014年1月15日)，「『八五·記憶·反思』座談會」、總第165期(2016年8月24日)，「紀念老舍專輯」，等等。
- ⑨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馬若德〕)、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著，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台北：左岸文化，2009)，頁69-117；王紹光著，王紅纘主譯：《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53-66。
- ⑩ 葉維麗：〈卞仲耘之死〉；Weili Ye, "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 203-40。卞仲耘是著名的文革時期學生打老師案例，1966年文革爆發之時，卞仲耘為北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實驗中學)副校長，8月5日遭遇該校學生長時間的辱罵、毆打等折磨後身亡。
- ⑪ 馬若德和沈邁克認為，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政治局的講話，說「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重點放在內、在上」，「有助於他們推測運動的方向」，「文革是毛及其心腹在私下策劃的」；最初兩個月高校之所以會發生「鬥鬼」，起因是「毛說的文革的重點『在內、在上』的完整內涵還未能被人們所理解」。書中所說的「他們」，

泛指中共各級幹部、普通黨員、共青團員等，乃至普通民眾。參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59、80、84。

⑫ 1966年5月21日的周恩來講話中，講述「上下內外」的同時，還高度讚揚上海市委說，「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學上海」。假如馬若德和沈邁克的看法成立，那麼上海市委（或許還包括華東局）算不算「黨內」和「上邊」呢？如果不算，上海文革的預設對象是誰？顯而易見，他們的看法不能成立。實際上，僅三天前，18日周恩來講過主題一樣但基調不同的話，其核心要義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已經挖出來了」。對此，《周恩來傳》解讀說，「他這時並沒有理解《通知》中這段話的真正含義。用他後來的話說，當時雖然已有些猜測，卻未曾想到是指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意圖，中央領導核心的這些成員仍全然沒有覺察」。詳見〈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841。

⑬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發行，1988），頁1-4。依照相關規定，對於中共內部文件，普通復旦師生只能聽傳達，無權親睹。不過，復旦歷史系造反組織「鬧翻天」的大字報，顯示〈五一六通知〉最晚不遲於1966年9月8日已被復旦普通師生所了解。詳見歷史系「鬧翻天」：〈堅決把復旦黨委拉下馬——揭開首批周予同的黑幕〉，載「史紅」戰鬥組編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輯，油印件（1967年5月），頁150。《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存在不同版本，第一、二合輯（1967年4月）為初稿本，第一輯、第二輯、第三輯分冊單行本（1967年5月）為修訂稿本，因不同版本的篇目有重疊、又存差異，本文優先徵引第一、二合輯。詳見徐振保口述，樊建政整理：〈我和《復旦文革大字報選》〉，《鐘山風雨》，2013年第4期，頁44-47。

⑭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上海歷史實錄（1949-200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頁422-23。

⑮ 上海交通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交通大學紀事（1896-2005）》，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頁559-61。

⑯⑰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596；600-601。

⑱ 楊士法：〈陳、曹在幹部問題上的反動罪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大會專刊》，第6期（1967年5月4日），第2版。

⑲ 馬達：〈一篇社論是怎樣出籠的〉，載《馬達自述：辦報生涯六十年》（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頁36-37。

⑳ 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3），頁71。

㉑ 《文匯報》編輯部、《解放日報》編輯部、《支部生活》編輯部：〈策動叛黨就是為了篡黨〉，《文匯報》，1967年8月9日，第1版。

㉒ 11月10日該文正式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於清晨給尚在睡夢中的姚文元打電話致賀，顯然深感與有榮焉。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3），頁502；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頁268-69；朱永嘉：《巳申春秋》，頁15-16。

㉓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577；王力：《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下冊，頁382。

㉔⑳ 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供大批判參考）》，鉛印件（1967年11月），頁6；6、7。

㉕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㉖ 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供稿，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印：《政治大騙子曹荻秋謊言集》，鉛印件（1967年6月），頁3；〈曹荻秋同志作中央工作會議傳達報告（記錄稿）〉（約1966年10月底、11月初），載新師大文革籌委會物理系「五敢」聯絡部、化學系「挺進」兵團聯合編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翻印：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論集》(1966年12月),頁29;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1963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案)〉,載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頁343。

⑳ 〈陳雲同志的三條意見(1980年11月12日)〉,載《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38。

㉑ 《復旦大學百年志》編纂委員會編:《復旦大學百年志(1905-2005)》,下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1685、1687。需要指出的是,該書上卷給出的相關數據完全不同,指出1952年「復旦有教授90人」,參見《復旦大學百年志(1905-2005)》,上卷,頁98。

㉒ 朱永嘉:〈周予同先生的為人和為學〉,載《讀史求是》(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15),頁370。

㉓ 譚其驤:《譚其驤日記》(上海:文匯出版社,1998),頁307-88;吳中杰:《復旦往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140。

㉔ 朱永嘉:《巳申春秋》,頁9-10、12、14;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頁260-61。姚文元是寫文藝評論出身,據朱永嘉回憶,姚文元根本不懂史學,更遑論明史;〈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寫作過程中,朱永嘉為唯一助手,主要是幫助找資料。

㉕ 中共復旦大學黨委:《中共復旦大學黨史大事記(一九六六年)(草稿)》,油印件(約1984年前後),頁10,復旦歷史系前黨總支書記余子道提供。

㉖ 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宣傳組印,上海海運學院紅革會紅色造反兵團「鬥批改戰鬥組」翻印:〈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楊西光的檢查交代〉(1966年12月8日),油印翻印件(1966年12月23日),頁1;〈陳丕顯同志接見復旦大學紅衛兵八位同學談話〉(1966年11月10日),載新師大文革籌委會「五敢」縱隊編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翻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負責人言論集》(1967年1月),頁37;〈「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發言——黨委副書記鄭子文晚上發言〉,油印件(約1966年12月11日),無頁碼;余子道訪談,上海,2014年3月28日。

㉗ 〈常溪萍在復旦談話紀要〉(1966年7月16日),載「史紅」戰鬥組編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油印件(1967年4月),頁52。

㉘ 「打倒王零」小組:《王零罪行彙編》,油印件(1967年9月7日),頁33-35;王零:〈向革命幹部教師請罪〉,打字油印件(1967年4月10日),頁8。王零在1955年復旦反胡風運動中被檢舉為「胡風份子嫌疑」。詳見朱永嘉:《巳申春秋》,頁64;復旦黨委前組織部部長李慶雲訪談,上海,2014年6月30日。

㉙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打字油印件(1966年9月8日),頁12-13、16、18;「心向黨」戰鬥小組編,生物系「赤衛隊」翻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手刻翻印油印件(1966年11月14日),頁5;〈校黨委要把我校文化大革命運動引向何處?〉(1966年6月20日)、〈四十個為甚麼——關於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問〉(1966年7月16日)、〈常溪萍在復旦談話紀要〉,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15-16、33-35、50-51;余子道訪談,上海,2012年10月11日。

㉚ 余子道:〈認罪服罪,重新做人:我的主要罪行的交代檢查〉,手稿(1969年2月22日),頁18,余子道提供。

㉛ 「無差別境界」論(又稱「沒有矛盾的境界」、「絕對境界」、「不矛盾境界」),是相對於有差別境界(又稱「矛盾境界」)而言的。顧名思義,是指沒有矛盾或差別消除、矛盾平衡、對抗消亡的境界,認為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着無差別境界或無矛盾境界,有「差別境界」,必有「無差別境界」,兩種境界對立統一於時空之中。「時代精神匯合」論認為時代精神是由一個時代的各種不同階級的思想意識匯合而成的統一整體,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裏,壓迫階級的思想意識和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意識,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被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都匯合為這些社會的時代精神;在社會主義時代,是由革命精神加上非革命的、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種種思想意識匯合而成為社會主義的時代精神。詳見周谷城:〈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新建設》,1962年第12期,頁64;〈再論「無差別境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4期,頁24-26、70。

- ⑩ 商臣鳴、李波：〈周谷城先生授課斷想〉，《春秋》（山東），2009年第1期，頁32。
- ⑪ 周予同：〈有關討論孔子的幾點意見〉，《學術月刊》，1962年第7期，頁36-39。
- ⑫ 周予同、湯志鈞：〈博士制度和秦漢政治〉，《新建設》，1963年第1期，頁54、55；周予同：〈從顧炎武到章炳麟〉，《學術月刊》，1963年第12期，頁46-52。「逆鱗」典故出自《韓非子·說難第十二》：「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嬰」是「觸動」的意思，「披逆鱗」在中國古代政治傳統中，寓意魏徵一類諫諍之臣向君主無畏進諫，甚至以死相諫。
- ⑬⑭ 余子道訪談，上海，2013年7月16日。
- ⑮ 〈上海學術界部分人士座談吳晗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文匯報》，1966年1月7日，第4版；陶增衍、歐陽靖、譚啟泰：〈堅決打倒反共老手周予同〉，《文匯報》，1966年7月3日，第3版；上海市委統一戰線工作部革命造反隊：〈陳、曹是上海最大的資產階級衛道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大會專刊》，第6期，第4版；郭志坤：〈三訪晚年周予同〉，《世紀》，2017年第4期，頁19-20。
- ⑯ 蔣孔陽（1923-1999），四川萬縣人，專攻美學和文藝理論，對美學基本原理和西方美學的研究尤為精深、獨到。劉大杰（1904-1977），湖南岳陽人，1952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1956年被評為二級教授，研究領域涉及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文學史。嚴北溟（1907-1990），湖南湘潭人，專攻中國哲學史、佛教史及佛教哲學。
- ⑰ 金光耀：〈文革爆發之初的基層黨委：以復旦大學為例〉，未刊稿，頁1-2；余子道訪談，上海，2012年5月2日。「安社稷」旨意不詳，待考，暫付闕如。
- ⑱ 歷史系「鬧翻天」：〈堅決把復旦黨委拉下馬〉，頁147-48。
- ⑲ 金光耀：〈文革爆發之初的基層黨委〉，頁2。
- ⑳ 《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5；〈把資產階級「權威」統統打倒，把毛澤東思想世代傳下去〉、〈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歡呼一張革命的大字報〉、〈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人民日報》，1966年5月31日、6月1日、6月2日、6月3日，第1版。值得一提的還有《人民日報》1966年6月6日的社論專門指出：「今年六月一日開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等重要社論，深刻地闡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有力地指導了當前的戰鬥。」參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人民日報》，1966年6月6日，第1版。
- ㉑ 雷群明：《逝者如斯：讀研日記（下）（1964-1968）》，自印本（2013），頁455、456、458、461、464、465。
- ㉒ 歷史系「鬧翻天」：〈堅決把復旦黨委拉下馬〉，頁151；余子道訪談，上海，2013年7月16日。
- ㉓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曹荻秋同志在六月十日全市幹部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6月10日），《黨的工作（週刊）》（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編印），1966年第26期，頁10；〈徹底揭露、徹底批判、徹底打倒〉，《解放日報》，1966年6月11日，第2版。1966年11月8日，周予同還因此被譚厚蘭等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再一次揪到曲阜進行批鬥。
- ㉔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6；《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9-13。
- ㉕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30-33；印紅標：〈文革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頁37-45。

樊建政 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董國強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